

论中国传统文化 在《喜福会》中的变异及其缘由

林瑞韬 石云龙

【摘要】华裔作家谭恩美《喜福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中传递的中国传统文化,如风水、五行等,这些中国元素也是西方读者关注的“充满神话性的原始色彩元素”。那么,书中描述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呢?本文将通过文本分析,结合中国经典古籍,探求这些传统文化的最初本源,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喜福会》中的变异,然后从历史主义研究、接受理论、文化研究等多个视角出发,寻找出文化变异的根由。

【关键词】《喜福会》;中国传统文化;变异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2-0145-4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元素,在美国华裔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最具有代表的即是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及其成名作《喜福会》。

在西方读者的眼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充满神话性的带有原始色彩元素;而部分中国读者也认为,《喜福会》给西方读者表现出中国文化的迷信、愚昧、非理性的落后的“他者”形象。“亚裔美国文学匪徒”之称的赵健秀“曾痛斥一批他认为被白人同化了的华裔作家,这其中包括了谭恩美、汤亭亭、黄哲伦和任碧莲等,‘这些作家失去了华裔族性,误读误用中国经典和传说,意取悦白人学者,歪曲华裔美国人本来的面目’……因而他们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已被殖民化了。”^{〔1〕}或许这样的批评太过绝对化,但的确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喜福会》这样的华裔小说中是否原汁原味?本文拟通过文本分析,结合中国

经典古籍著作,探求这些传统文化的最初本源,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喜福会》中的变异,然后从历史主义研究、接受理论、文化研究等多个视角出发,探寻产生文化变异的原因。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异

不可否认的是,《喜福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传达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国食物到中国麻将,从童养媳到姨太太,从神灵崇拜到祖宗信仰,从嫦娥奔月到王母娘娘,从民间巫术迷信到阴阳五行再到风水学说,从儒家思想到道家学说再到佛家修养,几乎大半中国文化都在《喜福会》中一一提及。然而,小说中所传递的如道家精神、阴阳五行、家族精神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一) 阴阳五行

谭恩美于莺莺的故事中提及阴阳。那是嫦娥

〔作者简介〕林瑞韬,成都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助教,四川 成都 610000;
石云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江苏 南京 210016。

奔月剧本里的唱段,嫦娥“伤心地哭诉着:‘女人属阴,心底黑如墨,隐藏私欲无穷多。男人属阳,心似一团火,照亮正道通银河’”^[2]。一方面,这句话隐射嫦娥私自吞长生药,是私欲和邪恶的象征,也歌颂了后羿射日,是正义的化身;另一方面,贬女褒男,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里男尊女卑的现象。于此且不说嫦娥奔月这一神话故事本身是否与传说有差,仅看文中提及的阴阳说。究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为何物呢?梁启超先生曾考证了《诗》、《书》、《仪礼》、《易》四经中有阴、阳二字的文句及其意义,其结论是:《仪礼》中全无“阴”、“阳”二字。“所谓阴阳者,不过自然界中一种粗浅微末之现象,绝不含何等深邃之意义”^[3]。阴阳最出名的来历是“《易》源说”:认为阴阳观念起源于《周易》。《庄子·天下》有言:“《易》以道阴阳。”^[4]“《易》中封象由阴阳二爻变化而成,故天、人、地都赋有了阴阳性质。天地、日月、暑寒、昼夜、男女、明幽、奇偶、君臣(民)、君子小人、尊卑、贵贱、刚柔、健顺、动静、进退、伸屈等等,各各为阳、阴之象。整个《易》,就是一套阴阳变异之象。”^[5]由此可见,中国的阴阳文化并不单单是“男阳女阴”这一说法,阴阳文化的核心是“天阳地阴”,讲求二气合一。

“男阳女阴”仅仅是阴阳文化中的一个微小的现象,并不足以成为诠释阴阳文化的内容。而即使是“男阳女阴”,阴阳学说也并没有贬阴褒阳的传统,反而是先阴后阳。根据《老子·六章》中记载,“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6]。

“谷”、“牝之门”指的是女性生殖器;“是谓天地根”,表明这是对女性生殖器崇拜。由此可见,所谓“阴阳”,置阴于阳之前,暗示先有阴后有阳。这个阴阳观念被推认为产生于女性生殖器崇拜或“母系”观念。

与阴阳学说紧密联系的是“五行”说。《喜福会》中,“五行”由媒婆口中煞有介事地道出:“这不明摆着嘛。五行缺一,女人生子。你儿媳妇生来不缺木、火、水、土,她少金……你给她戴上了金手镯、金首饰什么的,现在她五行俱全,也包括金,她占全了,反而不能有子。”^[7]那传统中的“五行”说又是什么呢?殷末贵族箕子的《尚书·洪

范》篇首次提出了“五行”说。箕子向武王提出了九条治国纲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五行。“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日五行……”五行之序、五行之性、五行之味,如下:“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8]至西周末年,史伯提出“五行相杂以成百物”的命题。到北宋时期,董仲舒把儒家学说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提出了完整统一的体验世界:“天有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9]由此可见,“五行”说,虽指金木水火土,然而它更代表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相生相克,相互循环,周而复始。查遍权威论著,没有一处把金与生育一事联系起来。即使金代指器官,它也指的“肺”、兼及皮、毛、鼻,而与生育繁殖无关。

由此可见,《喜福会》只选取表面与文化关联之处,并未展示阴阳文化和“五行”说的核心内容。

(二) 家族精神

“家族是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为基础的人类生活的基本群体。”^[10]家族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血统在家族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对中国人来说,家族就是一切,它是维系我们民族生息的虬根。”^[11]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的,家族才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柱石。正所谓“百行孝为先”,中国人对祖宗的“孝”正是家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周文化的继承者们,将敬天的“郊社之礼”和尊祖的“宗庙之礼”,视为几乎同等重要的祭祀礼仪。根据《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中分析,其实,就根本而言,“宗庙之礼”是通过尊祖,“嗣前人恭明德”,使先王“克配上帝”之德不断延续,是家族的“道德继承”,这就是“孝”的实质。^[12]孔子曾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3]

在《喜福会》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孝”字。一方面是年长一辈,她们对父母的尊敬、赡

养、听从、顺从以及为父母争光；另一方面是第二代子女，被教育要听从、服从父母，以报答养育之恩。小说的《红烛》部分，钟林东为了父母的“诺言”和“希望”，两岁就与一个比自己还小的男孩订亲，成为了童养媳，并且心甘情愿忍受这一段无爱婚姻，只因为“给家族增光就是出生的正当理由”^[14]。到最后下定决心摆脱这桩婚姻的时候，她也非常巧妙地选择了清明节这一时间，并依靠瞎编一些祖宗托梦的谎言，使得黄家主动结束婚约。

小说中对清明节的描述如下：“你在这天要思念自己的先辈，所以心思要清明。那天，人们都去祭扫坟，用锄头除草，用扫帚打扫石头子，用饺子和水果作祭品。哦，这并不是一个阴郁的日子，更象一次野餐，但对于求子求孙的人则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清明节的来历并不是“心思要清明”而得名。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因与寒食（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的日期接近，故渐渐与寒食合二为一，成为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明《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可见，清明节在尊孝尊祖的中国人心中，是神圣的，是哀悼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正是清明氛围的客观写照。故事中的“这并不是一个阴郁的日子，更象一次野餐，但对于求子求孙的人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则难免有失偏颇。除此以外，钟林东借助祖宗显灵一说，编派了三个谎言以示灵验，到最后黄家太太不仅吓得相信了丫环肚里的孩子是自家血脉，更是主动与钟林东解除了婚约，并给了她一大笔钱。这样的描写显然过分夸张了中国人对祖宗显灵的迷信和崇拜。

总而言之，谭恩美的《喜福会》中充斥着大量的中国特色文化：阴阳、五行、神灵、民俗、神话等，一幅一幅铺陈开来，就像一匹色彩斑斓的锦。但它们始终浮于表面，并没有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然而，“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不在于它绚丽多姿的表层形态，而在于其文化形态，或

象、言所表象的体验（意）、境界。”^[15]

二、文化变异的缘由

在《喜福会》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异，并不是一种偶然。这在其他华裔作家的作品中也呈现出相似的趋势。究其根本，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原因：作者自身的生平经历；作者刻意迎合西方读者口味；以及作者尴尬的文化身份：夹缝人。

（一）作者自身的生平经历

谭恩美，1952年出生于美国的奥克兰。她完全在美国成长，接受美国文化教育。对于中国文化，最初是来自于自己父母的言传身教。父母希望她能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但她在青年时期却是非常抵抗的。直到逐渐懂事后，她才开始体会到华裔只有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建立自己的独有文化。

但是，她和其他华裔作家一样，所创造的中国形象是通过他们父母的言传身教，通过华人社区及华人的中国观念、中国习惯的表现，特别是通过母亲所讲的中国故事（包括中国历史、文学、民间传说等），以及父辈们的非正式档案而想象的。借用安德森关于“民族”的概念——“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16]——来定义谭恩美的中国叙事最为合适。台湾学者单德兴也将这种对中国的呈现称之为“双重想象的故国”^[17]。

无论如何，这样的“想象”是搭建中国的最重要的“框架”，由想象进入“花繁叶茂”的中华文化，在西方语境和美国现实中，构建了自己族裔文化的“想象共同体”。因此，就连作者本人也曾“声称她写作的目的不是重现历史，而是创造艺术”^[18]。作为一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生活的作家，她所听来的故事，学习的文化都属于“二手”资料，难免不会不产生失真的后果。然而，作家自身的经历仅是原因之一，还有更深层的接受原因和文化原因。

（二）作者刻意迎合西方读者口味

谭恩美在写《喜福会》的时候，非常清楚地知道，书的主要读者是西方人。西方读者向往的正是神秘的中国文化。阴阳、道、五行、祖宗、嫦娥、王母等等玄之又玄的字眼，只要一出现，就会给西

方读者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感,至于其中实质,并不会有人深究。“这些中国文本,给不了解中国的美国人/西方人,创造了一个神秘诡异的人文世界。这些描述在今天的西方人/美国人眼里,必然还是表现为具有强大神秘力量的古老而落后的中国形象。”^[19]换句话说,刻意描写中国传统文化、封建迷信等画面可以为小说增分不少,吸引到更多的西方读者。

几个世纪下来,西方人已经对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固有的印象。在17—18世纪时,中国的艺术、建筑和哲学都受到西方人的推崇。中国的丝绸、茶叶和陶瓷还成为西方贵族阶层特别追逐的奢侈品。但是,从19世纪开始,中国的统治者闭门造车,盲目自大,中国和中国文化都与世界相脱离了。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已经是“东亚病夫”的形象,“封建”“落后”的代名词。这样的形象几乎成为了西方人的定式思维。

作者很好地把握了读者的好奇心,针对读者的口味,对症下药,描述了一幅又一幅中国特有的文化“风景”,赢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作者尴尬的文化身份:边缘人

青少年时期的谭恩美强烈感受到自己和一般主流白人社会的差异,曾一度盲目追随美国文化,努力抗拒父母灌输的中国传统。为了想变得更象

美国人,她甚至用晒衣夹夹着鼻子睡觉,抗拒中国食物。在《新闻周刊》(Newsweek)1989年4月17日的一次采访中,谭恩美说:“这是一种迷思,美国号称大熔炉,但同化的结果却是让我们刻意选择典型美国的东西,像是热狗、薯条,而忽略中国的东西。”由此可见,作为移民的第二代,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主动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在跨文化的异国形象创造中,创作主体的文化身份必然作用于作品,这是使异国形象产生区别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反过来,异质文化语境下创作的文学作品,潜在地表现和传达了文化身份和族裔政治等问题,因为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想象与虚构的产物,同时它也是社会的反应,是不同文化权力关系与政治差异的折射。”^[20]谭恩美是别种文化的中国人,《喜福会》中她把自己的意或体验,投射到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之象上;易而言之,他们力图把中国同化为他们的表象之象。这样,便最终使中国文化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中国文化所表象的体验、境界也就随之丧失殆尽。

一方面,传统文化是华裔作家的工具性资源,它们使小说具有引人入胜的异国情调,可吸引西方读者的关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出了美国华裔们所面临的夹缝身份和归属感的缺失。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华裔作家的笔下不可避免地产生“变异”。

【参考文献】

- [1] [11] [18] 王咏梅. 文化的“返乡”: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4, (3).
- [2] [7] [14] 谭恩美. 喜福会[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 238, 161, 251, 224.
- [4] 庄子[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5.
- [3] 梁启超.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M]. 上海: 上海古籍版, 1982.
- [5] [9] [12] [15] 谢松龄. 天人象: 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9. 62, 15, 62, 96.
- [6] 老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12.
- [8] 周秉钧注译. 尚书[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1. 33.
- [10] 吴增基. 现代社会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42.
- [13] 论语[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27.
- [16] 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3. 5.
- [17] 单德兴. 铭刻于再现——华裔美国文学与文化论集[C]. 台北: 麦田出版社, 2000. 182.
- [19] [20] 高鸿. 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77, 4.

(责任编辑 苏 宁)